

2012年度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阳海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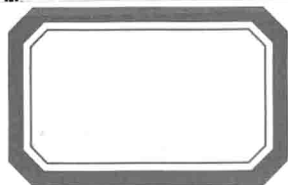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Zhongguo
Xiandai Xinwen
Sixiangshi

2012年度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阳海洪

—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Zhongguo
Xiandai Xinwen
Sixiangshi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 阳海洪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3 重印
ISBN 978-7-5438-9933-9

I. ①中… II. ①阳… III. ①新闻学—思想史—中国—现代 IV. ①D219.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7351号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作 者 阳海洪
责任编辑 戴 军 曾诗玉
装帧设计 杨发凯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933-9
定 价 4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作者简介

阳海洪，男，1969年生，湖南省冷水江市人。现供职于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新闻系主任。出版教材两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主持国家教育部课题一项，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两项，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一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应当重视中国新闻思想史的研究

(序)

—

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类的任何行动都是在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来完成的，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观念的牢笼。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历史的巨变时刻，往往是人的思想极为活跃、观点交锋极为激烈的时候，观念的冲击，会形成意识形态的暴风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著名思想家伯林认为，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对 20 世纪的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论断对于世界新闻史的发展也是正确的。近代以来的技术革命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使新闻的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制作，而进入了机器复制的时代，这种大规模复制为传媒的产业化提供了前提，推动了大众传媒的革命性变化；同时，借助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中所提出来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思想观念，大众传媒不但充当了意识形态革命的传播工具和实现渠道，也使人们对传媒的性质、功能等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传媒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扩音器”和“吹鼓手”，而是公民社会的有机构件，传媒的独立发展与自由运作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的标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重视新闻思想史的研究。新闻思想虽不创造历史，但它却塑造历史，还是大众传媒内在的生命律动，要了解传媒，要了解现代传媒中的问题，要了解现代传媒的走向，就要研究现代新闻思想。

二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它是在西方的殖民侵略中被迫进入世界现代性体系的。近代社会的车轮尚未启动，推动新闻事业现代化的两大推动力量“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远未形成，本土现代性资源稀缺，是

西方现代性观念在牵引中国新闻事业艰难地进行现代性发轫。因此，在中国新闻事业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规避西方新闻思想观念的影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进入，中国的新闻界会呈现出何种面貌。

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的基本主题。面对西方纷至沓来的现代思潮，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担当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充分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重要作用，而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话语权乃至取得政权，成为推动媒介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这样认为，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的大众传媒的演变比中国新闻史更能说明新闻观念变化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观念的演变史。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国新闻人对新闻的理解所塑造而成的。揭示现代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探讨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演变，以思想、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我们关于新闻史的解释，组织我们对新闻史的观察角度，应是中国新闻史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中国专制政治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使帝祚绵延，皇权永固，以科举牢笼士子，以“文字狱”禁锢思想，要求读书人画地为牢，以君为师，以吏为师，“思不出其位”。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灌输官方意识形态，读书人只能对经过统治者认定的经典进行读经、阐经和释经，以“民听一”的途径，用一人之思想统一全国人民之思想。因而，中国人历来缺少思想，不善思想，也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报人也不例外。从中国新闻史来看，官报自不待言，即使民间报房已经成为合法行业，《京报》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具备商品属性的新闻媒介，但也只能是“官报翻版”，不能有自己的采写的文章。这就决定了它是从属于封建政府的，根本不代表社会舆论。这种对封建政权具有强烈的依附性，缺少独立品格和精神的古代报业，既无法承担社会所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自然也难以产生办报思想。及至近代报业舶来中国，带来了现代新闻思想与观念，借助西方新闻思想资源，中国新闻人开始对大众传媒进行现代性审视，其思想观念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点刚刚萌生的现代性新闻思想，因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实际需要与传统文化的牵累，总是在政治和新闻中间摇摆不定。报人

的“职业自我”被唤醒的同时，那古老的“政治自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显得空前敏感和强化，正如格里德尔在其名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中所指出的：“使他们震动的不仅仅是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每一步都要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不稳定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形势作对照，来检验中国人的主观思想。”这说明，中国现代报人一方面接收了西方新闻观念，确定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外在的民族救亡任务又迫使他们一身兼起“新闻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角色，并且，政治依然是中国报人所目注心营的焦点，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新闻思想专业意识淡化，政治色彩凸显，具有高度的政治化特征。政党新闻宣传事业的政治性自不待言，即使是民营报人，对于现代新闻思想的核心概念——诸如“人性”、“人权”、“自由”等——少有讨论，而多以舆论为中心，以参与政治、改良政治为终极目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报馆”最重要的是“有益于国事”。

三

目前，新闻学界对中国新闻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相对而言，整体的、宏观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多是研究某个人物的新闻思想，或是研究新闻思想某一方面的发展历程。在这些个案研究中，民营报业与国民党党报新闻思想研究则比较薄弱，而对于中共党报新闻思想研究较为充分。在对以毛泽东的党报思想为代表的中共党报思想的阐释中，多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焦点，以“党性”概念为核心，以服务于党的新闻宣传为目的，轻视新闻思想本身的演变及其规律性特点，放弃从现代性的维度来理解新闻思想，自始至终把新闻思想理解为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呈现出高度的政治性与功利性色彩。这种“政治导向”的新闻思想史研究范式，已然不能适应当代新闻实践的需要。

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以市场经济、数字传媒技术与多元文化观念为基础，当代中国传媒，迫切需要与世界文化对话和深度对接，但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新闻观念依然在指导中国当代的新闻实践，形塑我们的媒介形态，束缚着中国传媒改变自我、融入世界的步伐。中国新闻业的改革

亟须观念的突破，只有创新观念，突破旧的思想观念，建立起我们对于新闻的全新认识，才有可能开拓中国新闻传播新的历史进程，而这，无疑需要历史的思想资源作为借鉴。

四

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是前人，特别是新闻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观点，但绝不只是重述前人的观点，而是要将其放在产生这些思想、观点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既指出它们产生的条件、原因和动机，又揭示它们与当时历史环境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以体现出对历史的尊重。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体现了这种尊重。这首先表现在作者学术态度严谨，坚持论从史出。作者基本上是在通读了所写新闻人物的主要著作之后才开始动笔的，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其对新闻思想的阐述是根据思想和材料本身的逻辑得出的。其次，表现在本书有着强烈的“现代”问题意识，它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语境化”与“专业化”，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作为思考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的历史背景，在这个现代转型中，中国的新闻精英是如何根据其所处历史环境来思考新闻传媒应该扮演的角色及新闻传媒本身应该如何来完成这个转型。作者能立足于“新闻专业”立场，以比较平视的眼光，介绍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共产党党报、民营报业和国民党党报这三种主要思潮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分析其所得与所失，让读者对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对于中国这个仍在进行现代转型的国家而言，读者可在对勘比较中思考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作者是以共产党党报、民营报业和国民党党报等三股新闻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为经纬来建构全篇的，这种体例虽能呈现出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的基本面貌，但学案式的编写方式使作者的有些论点难以展开，讨论难以深入，似有削平思想深度之弊。

阳海洪是个实诚人，讷于言而敏于行，好读书深思，在学术上有追求，为了写这本书，花了不少时间，阅读了不少资料，有些观点还是非常新颖的，或许会为我们理解中国新闻史打开一个更加宽广的视域，用心的

读者仔细去阅读，自己去发现、思考和讨论，自会有所得的。

以上所言，系有感而发，不成系统，聊做此书序言。

吴廷俊

2010年11月于武昌喻家山下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

目 录

001	绪论
-----	----

上编 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思想

015	第一章	舆论“随报纸为转移”：陈独秀的新闻思想
030	第二章	新闻本质是“经济问题”：李大钊的新闻思想
046	第三章	“《向导》是统一思想的工具”：蔡和森的新闻思想
061	第四章	报纸要“唤起人民的力量”：恽代英的新闻思想
071	第五章	党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瞿秋白的新闻思想
088	第六章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张闻天的新闻思想
107	第七章	“报纸是党的喉舌”：秦邦宪（博古）的新闻思想
124	第八章	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陆定一的新闻思想
134	第九章	报纸要指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周恩来的新闻思想
149	第十章	“为革命而办报”：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171	第十一章	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中编 中国民营报业新闻思想

191	第十二章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的新闻思想
-----	------	--------------------

207	第十三章	“报纸以提供新闻为天职”：徐宝璜的新闻思想
218	第十四章	“新闻纸为社会公共机关”：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230	第十五章	“报有报格”：史量才的新闻思想
241	第十六章	报纸是“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戈公振的新闻思想
256	第十七章	以“民众利益”为办报标准：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277	第十八章	做“真正给大众看的报纸”：成舍我的新闻思想
292	第十九章	中国报是“文人论政的机关”：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311	第二十章	《大公报》应成为“舆论中心”：胡政之的新闻思想

下编 中国国民党党报新闻思想

339	第二十一章	报纸“当创造三民主义之文字”：叶楚伦的新闻思想
352	第二十二章	报纸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马星野的新闻思想
368	第二十三章	党报“要尽量企业化”：程沧波的新闻思想
380	参考文献	
388	后记	

绪 论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是1919—1949年间新闻领域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发生发展之历史。

晚清以来，西潮东渐，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以其历史先进性，在与传统思想的竞争中，日益显示出其优长之处，官报式微，民报发达。在“众声喧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引进中国，并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在中国的“出场”，造成了国、共两种不同性质的官营媒介与夹在其间的民营媒介组成的三足鼎立的媒介生态，形成了三种新闻思潮，这在中国既往的新闻史中是从没有出现过的。这不仅改变了中国新闻史近代以来的发展路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遭到清理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思想成为强势话语。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国民党党报和民营报业的新闻思想不是简单的政治定性足以概括的，作为现代中国这个特定地域空间的产物，国、共两党和民营报业新闻思想的起伏消长构成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的复杂形态，同时，在这种复杂形态之下，中国现代新闻思想也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民族主义的历史动力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天下中心观”被彻底颠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①。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

^①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页。

“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必然先引导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自觉”^①。因此，“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②。完成现代转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绝对道德律令和难以摆脱的宿命，是几代知识精英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也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主义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无法化约的意识形态力量。因此，“中国近百年来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③。它同时承担着政治救亡与文化启蒙两大主题，这是近现代中国各种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动力核心。

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不是本土经济关系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从外部移植到中国境内的”^④。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虽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但在主观上，西方列强的根本目的不是促成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是为了开拓世界市场，因此，西方势力的到来，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这一发展的超前与失序。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近现代中国的基本主题。面对西方纷至沓来的现代思潮，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话语权乃至取得政权，成为推动媒介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总是伴随着问题产生的，三种新闻思潮在竞争中能否胜出，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与解答近现代中国的这个基本历史主题，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报业的发展没有更多的内在的经济动因，也缺失了必要的经济力量的养育，它始终从属于“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而未能获得自主独立的发展。贯穿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尊重难以成为现代中国新闻思想史的核心概念。

① 《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5页。

② [美]徐中约：《第六版序》，见氏著：《中国近代史》第六版，计秋枫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18页。

③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423页。

④ 《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16页。

二、现代性价值的预设前提

在被官方所认定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是以“五四”为界的。

中国在面对西方侵略的过程中，暴露出种种落后腐朽现象，这些现象表征着中国儒家所建构的政治秩序与道德文化在“五四”前后面临深刻危机。面对这双重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祭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即改造传统“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认同，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在这样的政治框架内，以容纳现代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五四”是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成为现代中国话语实践的意义策源地，各种话语正是从对这个“寓言”的阐述中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的。“五四”是现代中国的“镜像”，在如何理解、认同这个“镜像”的历史实践中，开启自己的现代之旅。中国现代新闻思想，不管是国、共两党还是民营报业，都认同“五四”所建构出来的现代价值，都以“五四”思想为共同的预设前提。

（一）民主。如张季鸾所说：“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①这种以英美自由主义为思想资源的民营报业新闻思想认为：为了保证读者获得客观真实的信息，记者在新闻报道时必须坚持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分离。在终极的信仰层面，在意义的世界里，完全是主观的，新闻只是为之提供材料，最终的价值判断必须由读者做出。因此。民营报业高扬“自由”、“民主”之旗，坚持对中国国民进行“自由”、“民主”思想启蒙，报纸应以向受众提供真实新闻作为报纸的基本功能，要求记者视自己为“社会公人”，在报道新闻时，要居于客观、公正的第三者位置，采取超脱的态度，尽力淡化个人的情绪色彩，如此才能提供真实的新闻。同时，报纸应为事实所涉及的双方提供辩论的机会，做到公正和平衡，让受众依赖自己的理性来做出判断，以培养民众的

^① 《季鸾文存》下卷，重庆：大公报馆，1944，151页。

独立意识。报纸为社会之公器与国民之喉舌，人人皆可利用以表达自己对于公共政策的意见，形成健全舆论，以监督政府，促使中国由皇权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样的考量之下，民营报业以文化启蒙和舆论监督为基本职能。

中国共产党人是从“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民主”、“自由”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民主”、“自由”的实现是以媒介资源的公平分配为物质基础的，在广大人民没有掌握媒介资源之前，这种建筑在私有媒介产权上的“新闻自由”是虚假的自由，仅仅只是维护资产阶级新闻权利的“自由”和“民主”。“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产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的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特错”。^①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农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新闻资源被文化精英和腐败政客剥夺和侵占的局面，尊重人民的新闻权利，把新闻还给人民，才能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思想以“阶级斗争”为把手，解构了民营报业的新闻思想，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的理解，完成了现代新闻思想的改造。

（二）科学。“科学”作为“五四”的旗帜之一，落实到新闻媒介上，就是如何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②郭颖颐指出，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有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③他们都力图以科学的方式，建构一套保证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新闻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兴起，认为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必须坚持客观主义的报道立场。记者应坚持站在“第三者立场”，为“社会之公人”，这是当时新闻学者的共同主张。邵飘萍强调记者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北京：三联书店，1984，67页。

② 阳海洪：《新闻真实观的演变脉络探微》，《当代传播》，2009，（5）。

③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①。黄天鹏说：“新闻记者既立在第三者的位置，唯一的职务在真实的报告。”^②这种客观主义的新闻真实观，具有如下特点：1. 记者应悬置自己的价值判断，以中立观点表述新闻；2. 客观主义的新闻真实观承认（包括记者）在认识上是“有限”的，不可能垄断真理，报纸必须努力做到公平和平衡，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应答机会；3. 将事实与价值（包括价值判断）分开，将价值判断留给读者，记者只是“登载真正之新闻，以为阅者判断之依据”。^③

这种客观主义新闻真实观遭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批判，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认为新闻真实应是反映社会本质的真实，“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也无所迎合，因此就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④。在1948年10月13日的《中宣部对华北〈人民日报〉发表〈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新闻错误的指示》里，中宣部批评了华北《人民日报》的客观主义倾向，要求该报进行自我批评。1948年11月8日华北《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克服宣传报道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在这篇文章中，该报认为，华北《人民日报》产生客观主义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透过现象的表面而找到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因而对事物的主流、本质，即“人民已经在共产党，在广大党政军民干部领导下，已经战胜灾荒，获得了甚至优于去年的收成”视而不见。^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里，现象不是新闻的真实，在现象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本质”，而这个“本质”是与记者的政治立场、革命态度密切相关的，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报道了

①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6-117页。

② 黄天鹏：《新闻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1934，84-85页。

③ 《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2页、49页。

④ 《陆定一新闻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6页。

⑤ 《克服宣传报道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华北《人民日报》，1948年11月8日。

这个社会“本质”，新闻才是真实的。

中国现代新闻思潮虽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一些观点初看起来，歧义甚大，但究其实质，都共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树立起来的这些现代性价值，一部现代新闻史，就是这些现代性价值在中国这个场域具体展开的历史，体现了这些价值的不同面相。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生存环境

鸦片战争在揭开中国历史“屈辱性”记忆的同时，也预示了中国历史即将面临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分布在中国广大的沿海沿江地带，为中国新闻媒介的生长寻找到了“现代城市”这个立足点。正是依托上海、北京等现代城市，中国近代新闻媒介开始萌生、发展，并逐渐发展起一套以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媒介监督等为核心的新闻思想，在现代历史舞台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性城市，同时也给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动注入了新的因素，带来了新的动力，改变了中国乡村变动先前所固有的方向。然而，中国地域面积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现代性因素在汪洋大海般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影响所及，只是若干贸易口岸周围及铁路等交通沿线，媒介资源集中于城市，而与广大乡村社会无关，呈现出高度“不平衡性”与“低度性”特征。“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对峙的社会经济文化二元结构，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①因此，如何改造乡村社会，使之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课题。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自己的依靠力量建立在农村社会，视农民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

^①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2页。